

来自西部的声音

——读马强作品集《雪落无声》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的地方，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愈是丰富。这似乎是一种悖论，然而却是事实。我们从马强小说中便能体悟到这样的追求。人们生活在那样贫瘠的地方，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耕耘，顽强生存。如果不是对生命充满敬畏，对生活充满希冀，内心充满信念，骨子里充满坚韧，很难想象他们面对困厄的自然环境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与智慧。他们默默地抗争着、征服着、劳作着、收获着、喜悦着、自动着。通过作品字里行间映透的意欲与意境，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侧隐之中的勃发，一种惊愕之中的感念，一

种干涸之中的浸润，一种重负之中的释然，一种绝境之中的重生，一种困苦之中的飘逸。于是，读者无不为之动容而感动。文学的力量而感奋。亦由此告别抑郁，走向灿烂。

当然，我们从马强作品集《雪落无声》(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也看到了人性中粗粝的一面，似乎也与此有关。然而，细看过去，我们发现这里隐含着传统的扭曲与几近断裂带来的危机与创痛，新旧文化碰撞所引发的金属的质感之音。也许，除了人性的善与恶之外，我们似乎还应看到，在我们孜孜以求的追寻

与张扬中，获得与缺失孰轻孰重?我们该该鞭打失去孝心与信义的生命躯壳，抑或是重新注入灵魂让他们获得新生?无疑，人类的美德是需要继承弘扬方可代代相传的，而人类的恶是无需继续依代代相袭的。所以才需要不断地抑恶扬善。我想我们从马强作品中读到了这些因素。

文学只是社会精神文化产品种类之一，却从来就不曾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关于此，人们似乎未曾认真正视过，因此，常常被所谓的“被边缘化”这样的伪命题困扰。而马强他们的创作实例，对这样的伪命题给予了无声的回答。身处中心者未必能写出左右中心之作，身居边缘者未必就被边缘化。这也是社会发展轨迹公平所在。或许，对于命运的公正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轨迹之上。文坛规律似亦不能超乎其外，感谢这个时代。

该集收录了作者近30篇作品，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更多更好的作品将在我们热切期待中诞生。

《晴川说诗》是一位满族诗人对家乡近50位诗友诗作的阅读感受，其间也有研究与评论，却与某些评论家那种拐弯抹角、术语连篇不同，他常常以抒情散文和随笔的调子，分析诗歌的魅力所在，抒发阅读的喜悦与感动，也偶尔给作者指出他见识的“瑕疵”。不论是说诗话或挑毛病，都说得简洁明白。正应了社会流传一时的那句妙语：“把话说得让人听不明白的是专家，把话说得让人一听就明白的是行家。”

晴川者即老诗人佟明光。他的诗龄只比共和国小一岁。1956年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时，诗歌组里只有承德的中学生何理比他小，他的年龄倒数第二。我说晴川是诗之行家，不是廉价的吹捧。他的诗集《大江行》《桦树船》《俯瞰高原》《燃烧的花期》《重新默契》(北方的太阳)和这部20多万字的《晴川说诗》就是佐证。

佟明光多次放弃了专业创作的机会，始终安于“业余诗人”的自由。其实他对诗歌的感情，对诗的坚守与酷爱，不亚于任何一位“专业诗人”。写诗欣赏诗，几乎成了他的一种生命状态和生存方式。即使是在诗歌常常被拿来取笑的今天，他痴迷诗歌的感情仍然凝重，不减当年。

曾几何时，那些神圣的、热烈的诗句，从“诗经”开始，诗词歌赋，几千年耀耀于中国文坛，被人们赞为智慧的结晶、爱神的家园。可是今天，面对这个极度变化的经济社会，诗似乎一天天显得无用甚至无聊了。

如今，人们三句话不离金钱。金钱的作用被无限地夸张，直至膨胀，而对灵魂的归宿则大不以为然，使纯粹的诗人蒙受着空前的困窘。至于更多不大纯粹或大不纯粹者，正在不同程度地遭遇自我感觉的排斥，现实以它带有某种魔力的诱惑，唤起了人性中对于利益与物质刺激的敏感，冷淡了诗性和审美的魅力。

当诗人不再使用形象化语言而改用政论式的叙事时，或是广告诗、颂赞诗、节庆诗大行其道且运气极好时，那些纯粹的诗人是否还恋恋不舍心中的率真与热情?

从少年时就把生命抵押进去的痴情的歌者晴川，绝不愿意看见“文学之兄”颓败的现状。虽然诗歌并不能代表一切，但要求诗歌面向人们的精神世界、贴近人心、歌唱真情、不情愿疏远大众的渴望并没有错。《晴川说诗》说的对象虽不尽相同，但呼唤的都是诗魂的归来，真善美的归来，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归来。

让人欣慰的是，中国诗坛仍有一些像晴川这样的麦田的守护者，他们不理睬也不在乎什么“现状”，继续怀着极大的热忱探索人类灵魂深处微妙的情感变化，继续躬身于底层，在平民百姓所渴望的生活里把握情绪，珍惜与升华感受。

行家说诗

——读《晴川说诗》

□高深(回族)

尽管他们对精神家园情深韵长，尽管他们捧读唐诗宋词时觉得无限幸福享受，却从不敢奢望像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海涅们那样到热情的大庭广众中高声朗诵自己的诗行。唐诗宋词离我们已很远很远了。

或许是诗歌太纯粹了，令我们担当不起。

有人认为，这个愈来愈“实惠”的世界，已经很难再给诗歌派上多少用场，因为不可能天天闹地震，更不可能一年有两个相同的盛大节日。如今偌大的中国，几乎所有的广场都在忙碌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市场活动中，文化已无条件地被经济踩在脚下，或是“忠心耿耿”地做经济的媒婆。在这样的背景下，晴川们仍然为振兴中华与振兴诗坛而同步而呐喊，并告诫文坛与国人：一个民族文明精神的沦落往往是与诗歌的沦落差不多一起开始的。

媚俗是文学艺术讨好商品经济的外在表现，更深层次的怪影，是以让你钱袋鼓起来的方式作障眼法，让人们思想麻木在睡梦状态，不再关心那些与钱距离遥远的哲学与主义。《晴川说诗》中的近50篇诗评，或明或暗地揭示了这种现象，告诉世人，诗人不仅要兜里有钱，更要头脑里有思想，要给人以思考。

“通俗”，在许多场合成了不折不扣的挡箭牌。谁都知道，只要“通俗”往前多跨过一步，就可能成为地地道道的庸俗。庸俗跟粗俗、媚俗，不是“乡亲”就是“邻居”。一些往前多迈了一步的“通俗口水诗”，已经被晴川等有远见的诗人命名为“口水诗”了。

我曾坦率地说过，技巧已无力举起诗歌的旗帜，诗歌迫切需要思考，尤其是反思。《晴川说诗》中就不乏这种反思。我们不妨盘点一下当今诗坛，寻找今日的郭沫若、康白情、冰心、徐志摩、闻一多、刘大白、朱自清、刘复、冯至、戴望舒、何其芳、艾青、臧克家、田间、力扬、袁水拍……我以为，凡要求苛刻一点的，十有八九会感到失望。

诗人是生活在世俗中而不按照世俗规矩过活的人；是活跃在人群中却保持着一颗孤独灵魂的人。晴川们心甘情愿地从事着自以自为的甜蜜的苦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他们将毕生独行于曲折泥泞的人生路上。只要是诗人认定的目标，他们会至死不渝，永不回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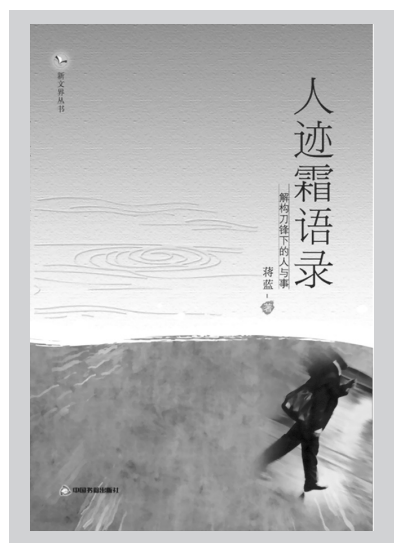
读蒋蓝的文字，感到他手中有剑，一个人背负着冰冷而多情的重物，跋涉在大地上。

2011年正月，零星的鞭炮声打破城市的清冷，升空的礼花，给暗夜嵌上一朵朵碎银的花儿。我躲在家中，读蒋蓝的新作《人迹霜语录》，这是他10年来创作的随笔。在他思想的“储藏室”中，存了大量的历史，蒋蓝走的是一条离火焰越来越近的险路。

历史堆积时空中，也在纸上流淌。很多研究者，在泛黄的纸中搜寻一条线索，然后发挥想象和所谓的“知识积累”，凭着一腔的激情拿出“新成果”。蒋蓝热爱大地，他要到民间去寻、去问，循着叙述者的讲述，浸满情感的回忆，填补历史的残缺。

祝勇在该书序中指出，如果说叙述历史被视为一种权力，那么蒋蓝对历史的重构则是对这种权力的反动，或者说，他在叙述中获得一种新的权力。蒋蓝不是一味地讲述“故事”，而是通过“故事”的背后，写了人的命运。

在成都，一条叫春熙路的老街，现在繁华了，过的人，有几人想过历史上的事情，这里发生过什么，有过哪一个人，在这儿被砍下头颅。他的血渗入泥土中，雨水冲去了血痕，时间掩盖了一切。蒋蓝只不过是去医院，做一次例行公事的体检，当他迈进医院的大门，离开阳光下的街道时，历史的人物，不是缓慢地走来，却是冲刺一般地扑来。他带着思索的复杂疑问，站在现代化的



医疗机器前，黑暗中举起双臂，左转、右转，接受工作一样的检查。蒋蓝的叙述从这开始，《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是他近年来的一个力作。面对太平天国的年轻将领——石达开，他一步步地推进，勘探、梳理得条理清晰。蒋蓝用文字，为石达开勾画出受难图：“绑在十字架上的石达开，像一张摊开的蜘蛛网。

行走大地 探寻历史

□高维生(满族)

血在地面编织着狰狞的构图，他的双眼被头皮覆盖着。残肢就像神话人物刑天一样，身体上突然睁开了无数双眼睛。”他的呈现和描述，抛开了“小我”的价值判断。

历史是人创造的，没有了人，历史就不存在了。蒋蓝站在当下，转身向时空的深处望去，他要疏散泛黄的浓雾，从一个人的心灵事件，做出判断。来李庄不止一次了，在张家大院里，走进卧室，不忍心在朽坏的地板多走两步。梁思成、林徽因、李庄、营造学社，都已成为时间深处的珍藏，但时间是个奇怪的东西，越久却越让人怀念。身在老旧的卧室中，面对旧物，蒋蓝不无感慨：“病到深处，时光就慢下来，往事在蒸发，由清晰而渐次模糊，就像远去的背影终于化到夜色。留给自己的，就是一片菜油灯聚拢的安详。”林徽因寻找的安详，是由菜子打出的油燃烧的小灯。她生命的血脉在病的消耗下，已经点燃不了激情的病了。朱大可的眼光毒辣，他在书的荐语中说：“大量的知识考古、狂热的历史想象、复杂的个人经验、丰富的诗歌意象以及批评家式的高谈阔论，这五种元素的任意组合，形成了一种狂飙式的语势。这

跟周作人倡导的“娓语”式随笔截然不同。它不是把人引向灯下的闲适，而是令人起坐，转向更为亢奋的日神状态。”

对刘文彩的阅读经验，源自于少年时的课本文章《收租院》，一个万恶旧社会的剥削者形象。我们不知道真实的刘文彩，更不知道他身边的跟随者凌君如。通过一张凌君如的照片，对她的一生，蒋蓝做了长达5个月的田野调查，走访了好多人。他来到当事人的出生地和“重点”事件发生地，实地寻访。2009年，蒋蓝第二次来到宗场。在那条“凌家小道”不起眼的土路上，曾经走过一位被历史留住的人物。在时空交点上，蒋蓝遇到了70多岁的颜绍成夫妇，他的父亲在凌家就是抬轿子的长工，亲眼见过凌君如。只停留在纸上，不可能有这样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蒋蓝没有一味地囿于资料上的操作，他深入到民间调查，从事件发生地，感受地理背景，问询身历其境的当事人，他没有主观断论，而是“故事”地呈现，考辨史实。蒋蓝有古典的浪漫气质，更有诗人的敏感。他是一个孤独的精神侠客，生命的温度，融入笔尖，探向历史深处。

远去的背影留下了永恒记忆

《远去的背影——云南民族记忆1949—2009》编撰札记

□杨福泉



①1956年，第一任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族县长孔志清和民族干部正行走在高黎贡山的大哈土一带



④1958年，云南金平县搬出深山前的苦聪人(拉祜族)

⑤2007年，金平县六搬村的苦聪人(拉祜族)

1985年，我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之后不久，就知道院图书馆收藏有一大批堪称瑰宝的老照片，这批照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开始的一段波澜壮阔、促成当今中国56个民族格局形成的壮举密切相关，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大调查”及70年代拍摄的民族地区照片。这批照片具有某种“垄断性”的价值，因为在1949年之前和1978年之后，很多国外人士也在云南拍摄过不少照片。而1949至1978年这段时期反映云南各民族的照片，尤以中国人所摄最为重要，特别是“民族大调查”期间的照片，更成为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

寒来暑往，我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整整24年之后，机缘来临，我们和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商定，要合力推出《云南民族记忆1949—2009》，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我作为主要的策划和编撰者之一，开始组织这本巨著的编撰工作。



⑥1983年，云南大姚县湾碧乡高坪子村，金沙江边的傣族人



⑦2004年，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山的布朗族孩子

从1950年到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出学者专家参与的民族访问团和视察组，深入到西北、西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检查民族工作，调查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1956年至1964年，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提议下，全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的调查。1956年春，大规模的全国民族调查开始进行，组织了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8个调查组，1958年组织了16个调查组，一大批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参加了这次大调查。参与调查的人数、范围、内容和其产生的深远影响，为世界仅有。

这次民族大调查，最后形成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通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书》，皇皇巨著，彪炳于世，成为中国民族志的瑰宝。而其中独缺系统的一部影像图集，成为美中不足的憾事。

1980年在原来的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基础上成立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是建立在这块民族学沃土上的云南最大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不仅拥有一批优秀的民族学学者，而且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各民族历史文献资料以及民族志资料。其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所进行的

那次大规模的中国民族大调查中所形成的“云南民族调查手稿资料”、“云南民族调查照片资料”、“云南民族调查电影资料”、“云南民族调查文物古籍资料”等民族志系列资料，成为云南社科院图书馆独具特色和弥足珍贵的重要馆藏。

该院的一批学者，曾参加了当时的民族大调查，参与了7部反映云南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并收集了大量的民间文献资料，还有手稿、调查笔记等，此外，还拍摄了大批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民俗等的黑白照片。收进本书的照片，也有一些是该院学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田野调查中所拍摄的，珍藏在该院图书馆。

为了让这本大型学术画册达到“深度读图”的境界，最终定了这样的原则：画册所选的7个民族的文字撰稿，主要由长期以来对这个民族有深入研究的云南社科院学者担任，以保证其客观真实、可信等学术性。如对基诺族有数十年的跟踪调研，并促成了基诺族在1976年被认定为第56个民族的杜玉亭研究员，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参与民族大调查并参与拍摄照片的汪生研究员、杨光海研究员、刘达成研究员，对景颇族、德昂族等进行过长期研究的桑耀华研究员，长期研究普米族的杨照辉研究员等。

而每一位撰稿者除了认真撰写概述文章外，对每一张照片都有细致和真实客观的文字解说，争取让读者从每张照片上获得尽量多的信息，比如照片中的服饰、其做法、用料、服饰所体现的文化观念都有言简意赅的介绍，其他诸如反

映各种衣食住行、生产生活习俗、宗教礼仪等的图片，也突出了学术性的解说。有的甚至不辞辛苦找到了照片的当事人，所以在不少图说中，可以读到照片中的具体地点、人物的名字等详情。

而各位专家们在整理编撰过程中，目睹这些老照片也是感慨万千。他们回忆起当年干部、民族调查队、医务人员等深入边远村寨，和各民族群众交朋友、和他们同吃同住、参加劳动、为民众看病等感人的情景。比如书中有好几张反映“苦聪人”(今初期划归到拉祜族)在上世纪50年代初别生活在深山老林、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几乎衣不蔽体的老照片，如今苦聪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聚居的村落焕然一新，村里的老人们目睹当年的这些老照片，感慨万千，回忆起当年党和政府帮助他们建立村寨定居，民族调查团的成员们和他们朝夕相处、亲如一家难忘的往事。

比如著名的“丽江古乐”老艺人、老东巴等活动的旧照，老艺人们当时多是在纳西院落或是山野地头自娱自乐地演奏古乐，有人已经去世，而他们所传承的文化，在当代则发生了不同的命运变迁。如今，纳西古乐队已经应邀到20多个国家演出，每天晚上在丽江古城的演出也是门庭若市，收益颇丰。东巴文化也走出国门，丽江图书馆等收藏的东巴古籍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东巴书画雕刻”等工艺品在旅游市场上也十分火爆。当然，如今随着在民间东巴教信仰的衰落，知识渊博的东巴已经越来越少，民间的东巴文化活动也日益减少。书中有

纳西族民间著名女歌手和顺良在田间唱民歌的老照片，而如今，她唱得出神入化、脍炙人口的一些民歌，已经濒临绝境，后继无人。本书老照片中所见的各民族不少丰富多彩的建筑、手工艺、服饰、歌舞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面临保护传承的重任。

岁月如风而往事如烟，如今，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本学术画册里的旧影老照，已经都是“远去的背影”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云南的民族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云南民族文化也促进了云南社会的和谐、经济的发展。本画册的下卷图文，聚焦在这30年的巨大变迁上。把上册与下册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后各个民族的影像资料相比较，我们对云南各民族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变迁，会更有种历史深度的认知。

老照片是对历史的一种新角度的诠释。2003年在美国某大学讲学期间，我看到了美国学者如何苦心收藏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大调查期间拍摄的各种影像资料并把它们用于教学。而研究云南的著名外国学者如美国籍奥地利学者洛克(J.F.Rock)拍摄于1949年至2001年间的反映云南自然和人文的老照片，曾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曾合作过的国际山地协会主席艾福斯、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生态科学家莫斯利(Bob Moseley，中文名保山)，都先后来云南对洛克这些老照片按图索骥，从完全相同的角度重新拍摄这些老照片的场景，看其数十年的变迁，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我也看到法国官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拍摄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批反映云南的老照片，这批照片百年后被公认为是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这些老照片在我国展览和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而《云南民族记忆1949—2009》，则是我国民族工作者们筚路蓝缕地进行云南民族调查时的实录，是我国独有的影像民族志成果，它弥补了我国学者用影像全面反映云南各民族社会和生活方面的一项空白。这些从历史深处挖掘出的珍贵影像资料，凝固了一段段民族历史的鲜活记忆，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刻录下一段民族发展变迁的永恒社会记忆。

背影已经远去，而一段珍贵的历史和岁月，已经长存在这本画册中，岁月沧桑，人间巨变，有旧影老照为证，可使后人回眸过去、展望未来，再创历史新篇。

《远去的背影——云南民族记忆1949—2009》(黑白卷)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永恒的瞬间——云南民族记忆1949—2009》(彩色卷)将于2011年5月出版